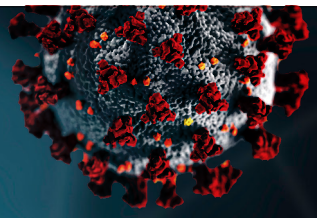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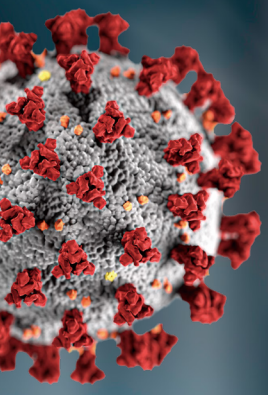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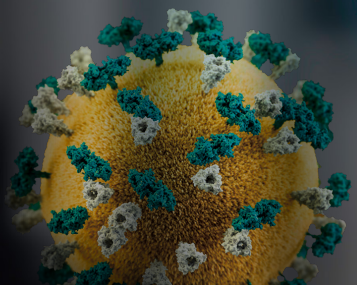


COVID-19 的 經濟烙印

COVID-19 衝擊全球經濟，
讓貧富差距惡化、族群對立加劇，
疫情也反映出許多國家
在性別平等的努力不足。
借鑑國際經驗，
臺灣在疫後又該如何拼經濟？





1,478.68
1,327.04
1,042.09

東京奧運空場舉辦 對日本經濟的影響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 林賢參

臺灣選手在 2020 年東京奧運表現傑出，振奮全臺人心；然受 COVID-19 影響，東京奧運空場舉辦，卻讓日本經濟損失慘重。

日本過往舉辦奧運之歷程

日本是第一個爭取到舉辦奧運的亞洲國家。早在二戰前，日本為東京爭取到 1940 年第 12 屆夏季奧運主辦權，惟因日本於 1937 年發動侵略中國大陸的盧溝橋事變，於翌年遭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違反奧運精神為由，取消東京主辦權，並移轉給芬蘭赫爾辛基。不過，該屆奧運最終因為芬蘭與蘇聯爆發戰爭，以及納粹德國在歐洲肆行侵略而被迫取消。

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前後成功舉辦過 1964 年東京夏季奧運、1972 年札幌冬季奧運、1998 年長野冬季奧運，連同 2020 東京夏季奧運共計 4 次。1964 年東京奧運

（Photo Credit: Dick Thomas Johnson, https://flic.kr/p/2m2Fr6S; France Olympique, https://flic.kr/p/2mcY39s）

日本曾舉辦過 1964 年東京夏季奧運、1972 年札幌冬季奧運、1998 年長野冬季奧運與 2020 年東京夏季奧運等共 4 次；圖為 1964 年東京奧運之場景與廣告看板。（Photo Credit: Project Kei,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okyo_Olympic_Closing_Ceremony_19641024.jpg; Phil Kates, https://flic.kr/p/hgaKo）

主辦權，是在岸信介內閣任內爭取到的，惟岸信介本身無緣以首相身分主持開幕即已卸任。2012 年 12 月 26 日，岸信介外孫安倍晉三以卸任首相再度登上首相寶座後，積極爭取 2020 年夏季奧運主辦權，並且順利地於翌年 9 月 7 日，為東京爭取到第二次奧運主辦權。安倍爭取 2020 東京奧運主辦權，不無媲美岸信介爭取到 1964 年東京奧運的個人因素，並且在長期執政後，更希望超越岸信介，以首相身分主持奧運開幕式。惟天不從安倍所願，受到 COVID-19 全球大流行影響，東京奧運延期至 2021 年舉行，安倍卻在 2020 年 9 月以健康因素請辭下臺。

爭取主辦東京奧運的經濟效益期待

當然，日相安倍爭取 2020 東京奧運主辦權，並非僅止於個人因素。重要的是，安倍期待透過舉辦奧運可能帶來的經濟效果，提振日本經濟失去 20 年成長動力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三支箭、特別是第三支箭「喚起民間投資成長戰略」增添籌碼。

根據東京都奧運／帕運準備局於 2017 年 9 月的估算，從爭取主辦權的 2013 年 9 月到賽後 2030 年的 18 年間，如果依照既定的 2020 年舉辦，東京將可獲得直接效果約 2 兆日圓（下同）、大會結束後效果約

日本東京奧運準備局曾預估，東奧能為日本帶來的經濟效益高達 5 兆 2,192 億日圓（約 1.5 兆臺幣）；圖為東奧運動場館與交通建設之興建過程，左圖奧運主場館造價約新臺幣 440 億。（圖片來源： 江戸村のとくぞう,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Kokuritsu_Kasumigaoka_Rikujo_Kyogijo-18b.jpg; Bernhard Scheid, https://flic.kr/p/UKVLtR）

12 兆的需求增加額；在經濟波及效果（增加生產額）方面，東京約可獲得 20 兆，全國計算即可達 32 兆；在增加僱用方面，東京約可增加 130 萬人僱用機會，全國約增加 194 萬人。其中，需求增加額直接效果的估算項目，包括比賽場地設施與交通網整備、大會運作、大會參加者與觀眾的消費、家庭消費、比賽實況轉播、企業行銷活動等支出；大會結束後的經濟效果，則包括新建恆久設施與選手村再利用的支出（例如：東京都內相關交通基礎建設整備、無障礙空間整備、普及氫氣燃料使用整備等），運動相關、動員東京市民參加與義工、教育與多元化的支出（例如：帶動運動關聯消費、振興身障者運動、提振市民參與義工意願、增加文化活動參與者、增加外國留學生等），以及經濟活性化與活用最尖端技術的支出（例如：接待外國觀光客的環境整備、擴大觀光需求、形成國際商業據點、振興中小企業、擴大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與機器人產業等）。

此外，在直接的經濟波及效果方面，東京可獲得約 3 兆 3,919 億、全國約 5 兆 2,162 億；在增加附加價值方面，東京可獲得約 1 兆 7,287 億、全國約 2 兆 4,824

億；在就業率方面，東京可增加 20.7 萬人就業、獲得約 9,708 億效益，全國則有 30.6 萬人、獲約 1 兆 3,664 億效益。其中，大會運作與比賽場地設施整備項目的效果變大。至於奧運結束後的經濟效益方面，東京約可獲得 17 兆 488 億、全國約 27 兆 1,017 億；增加附加價值方面，東京約可獲得 8 兆 8,874 億、全國約 13 兆 516 億。在新增雇用者所得方面，東京約可增加僱用 108.9 萬人、雇用者所得額約 5 兆 1,765 億，全國約增加 163.3 萬人、雇用者所得額約 7 兆 3,492 億。其中，經濟活性化與活用最先進技術項目的效果變大。

根據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永濱利廣分析，以 1984 年洛杉磯夏季奧運以降、主辦國平均經濟成長幅度為例，奧運舉辦前 3 年累計提升的國內生產總額（GDP）為 9.2 兆，而舉辦當年則有 1.7 兆。舉辦前經濟效果較大的原因，在於賽前競技場地與相關基礎設施的整備費用支出。依照經驗法則來看，東京奧運在 2019 年為止，可能已經為日本 GDP 貢獻了 7.5 兆左右。

延期一年又空場舉辦的經濟損失

遺憾的是，受到疫情的影響，2020 東京奧運雖然沒有取消，但是，卻延期一年舉辦，還採取無觀眾入場的方式進行，不但前述估算可獲得的經濟效益歸零，甚至還要造成額外的損失。由日本奧委會與東京都廳組成的東京奧運帕運組織委員會指出，在奧運決定推遲一年之前，預估支出總經費為 1.35 兆，而決定延期後，新增加防疫費用及會場一年租金等共計近 3,000 億支出，導致舉辦經費調漲至 1.644 兆。原先預估東京奧運帕運組委會的全部 7,210 億收入中，國內外贊助商贊助約 4,060 億，其次是 900 億的門票收入。賽事改為空場進行後，造成原先預估的門票收入歸零，再加上新增加防疫對策費用，預估東京奧運帕運組委會的虧損將超過 1,000 億，衝擊到東京都廳的財政。誠如前述永濱利廣的分析，空場舉辦賽事最大的損失，就是門票收入、海內外觀眾到東京觀賽的相關旅遊、購物、食宿等消費性支出。

空場舉辦賽事最大的損失，就是門票收入與海內外觀眾到東京觀賽的相關旅遊消費性支出。（Photo Credit: France Olympique, https://flic.kr/p/2mdrcnG; Dick Thomas Johnson, https://flic.kr/p/2m2Frg1, https://flic.kr/p/2msszxf）

另一方面，雖然東京奧運的全球電視轉播權利金收入約有 3,000 億，惟該款項是屬於國際奧委會，其中約有 9 成用於補助奧運項目的國際體育單項聯合會、各國奧委會、各屆奧運會舉辦的組委會等。如果沒有該項收入，國際奧委會將無力補助奧運項目的各項運動賽事，衝擊到各項比賽的舉辦，甚至影響到發展中國家奧委會的運作，最終導致渠等難以派遣運動員參加奧運，此乃國際奧委會無視於疫情嚴峻、堅持要舉辦東京奧運的背後原因。事實上，依照國際奧委會與奧運舉辦城市的契約，除非舉辦國爆發戰爭或內亂，否則只能由國際奧委會單獨裁量認定，賽事場地是否具有深刻威脅到參加者安全的理由而予以取消。

根據日本關西大學教授宮本勝浩在今年 1 月 22 日發表的報告指出，如果取消東京奧運，將造成日本經濟損失約 4 兆 5,151 億，延期一年、且又無法正常地舉辦，將損失 1.38 兆，如果空場舉辦，損失將增加為 2 兆 4,133 億。宮本勝浩指出，不管東京奧運是以何種型態舉辦，COVID-19 疫情

日本為籌辦東京奧運所進行的自動駕駛、5G 通信、氫氣燃料等技術研發，將對今後日本的社會、經濟、醫療、生活等各層面發展做出貢獻。（圖片來源：江戶前鰻，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RBUS_KANTO-L530-20501-2.jpeg；日本總務省，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633132.pdf）

擴大，對日本經濟打擊甚大。不過，誠如前述永濱利廣分析所言，東京奧運雖然是空場舉辦，但是，本屆乃是在全球疫情下所舉辦史無前例的奧運，肯定在奧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為參賽者留下終身難忘的記憶，更能夠為日本帶來全球性宣傳的廣告效果。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東京奧運在部分日本民眾上街頭抗議聲中開幕，而在開幕前的媒體民調中，有 3 成以上民眾要求取消。在開幕與閉幕的前夕，國際媒體也有許多褒貶不一的評論，而普遍獲得好評的是，奧運期間雖然東京疫情擴大，惟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可歸咎於奧運，為今後世界性大規模運動賽事的舉辦創下新例。從目前帳面上來看，東京奧運可能為東京都廳留下巨額債務，也未能替日本帶來觀光熱潮與龐大消費。但是，誠如前述宮本勝浩教授所言，日本為籌辦東京奧運所進行的公共事業已經實現其經濟效果，為東京奧運所研發的相關影像傳播與通信技術、自動駕駛等智慧型運輸系統技術與機器人產業的擴大、5G 通信系統的進展、東京周邊交通網的整備或更新、實現氫氣燃料社會等技術研發，也在持續進行中，東京奧運結束後的遺產效果，將對今後日本的社會、經濟、醫療、生活等發展做出貢獻。

一個疫疾、兩個世界
COVID-19對美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拜登及其公衛團隊一再呼籲美國民眾戴口罩、打疫苗，然共和黨執政各州卻相應不理，並將衝突升高至憲政層次，認為強制戴口罩、打疫苗，係侵犯到憲法保障的自由人權。（Photo Credit: Pamela Drew, https://flic.kr/s/aHsmWKUBe8; https://flic.kr/s/aHsmWZz53X）

◆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兼主任秘書 — 胡聲平

COVID-19 對美國的影響既深且廣，社會面而言，疫情加深美國原已難以撫平的價值分岐，造成理念對抗；經濟面來說，則是進一步惡化貧富差距，導致階級對立。

1860 至 1864 年的南北戰爭雖已結束 150 年，但美國南北方人民心理上的無形鴻溝依然存在。（Photo Credit: Kurz & Allison）

COVID-19 疫情迅猛攻陷全球

2019 年爆發的 COVID-19 疫情，使全世界面臨猶如 1918 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之慘烈狀況。由於全球化的結果，這個首先發現於中國大陸武漢的疫病迅速在各大洲蔓延，其傳播力遠超乎百年前的流感。歐美國家起初對疫情漫不經心，甚至對中國大陸語出嘲諷，萬萬沒想到現世報來得既快又猛，原被西方國家認為只有黃種人才會感染的病毒，轉瞬間攻陷歐洲及美洲大陸。

價值理念對抗

美國在共和黨籍川普總統領導下，面對疫情態度輕佻、應對方案荒腔走板，使得 COVID-19 在美國各州快速傳播。醫療衛生先進的美國，染病及死亡人數竟然一度高居世界第一，直到 2021 年印度疫情大爆發後，才讓出不名譽的染疫死亡數冠軍寶座。

川普應對疫情無方、終致連任失敗。2021 年 1 月民主黨籍拜登總統就職後，力拼在 7 月 4 日國慶日達成全美疫苗接種率 60% 的目標，雖然好不容易在 8 月 4 日達成，但此比例仍遠低於傳染病學家認為要控制病毒擴散至少要有 85% 至 90% 的疫苗接種率，無法阻擋 Delta 變種病毒在南方肆虐。病毒的快速變化固然是疫情再起的原因，但美國共和黨政客拒戴口罩、拒打疫苗的主張，才是助長疫情升高的元兇。

美國佛州上訴法院竟做出裁定，宣布佛州各級學校不得強制師生戴口罩，導致兒童染疫遽增；左圖為大學生上課時自主戴上口罩，右圖為佛州家長與學童希望大家戴上口罩之請願情形。（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Michigan, Ford School, https://flic.kr/p/2myDLke；路透社／達志影像）

拜登及其公衛團隊一再呼籲美國民眾戴口罩、打疫苗，但共和黨執政各州卻相應不理，並將與聯邦政府的衝突升高至價值理念與憲政層次，認為強制戴口罩、打疫苗，侵犯憲法保障的自由人權。其結果便是共和黨執政的南方各州疫苗接種率遠低於民主黨執政的西部及東北部各州。直言之，1860 至 1864 年的南北戰爭雖已結束 150 年，但美國南北方人民心理上的無形鴻溝依然存在。

尤有甚者，共和黨籍佛羅里達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因有意角逐 2024 年總統大位，為接收川普的支持者，不但下達佛州的禁口罩令，並在今年 8 月初下令佛州公立學校禁戴口罩，且針對規定戴口罩的學校，延遲經費補助及扣發薪水。果不其然，在開學後，佛州學童染疫人數為全美第一，佛州病疫的染疫率及死亡率高居全美之冠；真可謂是政客不仁，以人民為芻狗。

佛州一群家長不服州長禁令提告，結果 8 月底佛州法官古柏（John Cooper）否決佛州州長禁令，裁定家長勝訴。佛州政府不服判決上訴，9 月 11 日，美國佛州上訴法院竟做出裁定，宣布佛州各級學校不得以抗疫為由，強制師生戴口罩。

佛州上訴法院的判決使得共和黨大受鼓舞，然而這項判決無疑將使疫情雪上加霜。佛州已然成為全美疫情重災區，其 COVID-19 確診率為全美 3 倍。此外，至少還有 7 個共和黨執政的州禁止學校頒布「戴口罩令」，例如德州、阿肯色州、南達科達州等，使疫情更加速升溫。截至今年 8 月底止，德州只有 49% 的疫苗接種率、佛州更低到只有 44%。美國南方州不打疫苗、禁戴口罩的結果，致使美國遭受第 4 波疫情衝擊，美國兒童 8 月染疫遽增 84%，新增感染人數超過 10 萬。另依官方數據資料，全美染疫死亡人數，已超過「西班牙流感」的全美死亡人數 67.5 萬人，堪稱為美國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浩劫。

總體來看，美國疫情再度升溫，除了與變種病毒有關，另外就是肇因共和黨和右派人士基於價值理念的反對，導致接種意願降低。最諷刺的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8 月 21 日在阿拉巴馬州一場共和黨大型集會中鼓勵支持群眾接種疫苗，卻遭到川粉噓聲以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股反疫苗風潮已有轉向趨勢，不少先前拒打疫苗的共和黨議員都公開施打，就連親共和黨的福斯新聞臺，態度也 180 度大轉變，要民眾相信疫苗科學。共和黨政治人物及媒體的轉向是否能扭轉南方各州之態度，可拭目以待。

貧富階級對立

疫情也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去（2020）年 3 月疫情於美國爆發，使美國經濟陷入危機。2020 年總計美國經濟萎縮 3.4%，是自 1946 年以來的最大降幅，其中消費者支出下降 3.9%，為 1929 年「經

美國經濟受疫情影響，大量企業與零售商倒閉，失業率暴增，嚴重打擊中下階層的經濟收入。（Photo Credit: Jonathan Cutrer, https://flic.kr/p/2jzToMd; Elvert Barnes, https://flic.kr/p/2iQcdNH）

濟大蕭條」後最糟表現，由於消費支出占美國經濟的比例高達 2/3，美國中下階層的經濟困境已波及到整體經濟；此外，企業投資和出口也遭受衝擊，全年固定資產投資下降 1.8%，出口下降 13%。

疫情對美國經濟亦打擊就業市場與企業經營，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失業率暴增，在疫情爆發前的 2020 年 2 月，美國失業率為 3.5%，但到 2020 年 4 月失業驟升至 14.8%，是自 1948 年以來的最高水準，主要原因是美國去年 3 月強制關閉所有非必要事業，這項封鎖措施使全美經濟陷入困境，導致創紀錄的2,236.2萬人頓失工作；二是企業與零售商倒閉，根據標普智匯公司 2020 年 9 月的報告，美國企業破產數量已創下 10 年新高。

美國聯邦政府採取了兩項措施來挽救美國經濟：一是財政紓困，先後投入了超過 6 兆美元的資金，包括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國會批准了 3 輪對美國家庭的紓困，此外還提供了各種商業援助，並實施以消費者為導向的計畫，比如增加和延長失業救濟，以及抵押貸款延期計畫；二是聯邦準備理事會（美國中央銀行）持續量化寬鬆，每月向市場注資 1,200 億元美金，並調降銀行拆款利率，其效果可以減少消費者信用卡、汽車貸款、住房抵押貸款等款項之利息支出。

在上述措施下，疫情對美國經濟的打擊雖猛烈但並不持久，據美國商務部的數據，美國經濟從 2019 年第四季的高峰到 2020 年第二季，平均萎縮 19.2%，創下歷來最嚴重的萎縮，顯示疫情確實使美國經濟受到前所未見的重創；但數據亦顯示，美國經濟從谷底復甦的速度也同樣快速，2020 年第二季至第四季美國 GDP 平均成長 18.3%，創下歷史新高；同時，根據美國主要經濟研究機構的預測，變種病毒對經濟成長雖造成風險，但仍對美國 2021 年下半年經濟成長表示樂觀，由於消費者支出占美國經濟的 70%，故多數專家認為，只要美國人持續消費，經濟成長就能夠延續，目前美國經濟面臨的較大風險是通膨加速。

然而，不可否認，在疫情肆虐下，美國中下階級民眾仍受到重創、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創新高，美國低薪勞工的就業率下滑了 20%，遠高於平均值；但巨商富賈卻受惠於股市先大跌後大漲，使得財富暴增、貧富差距更形擴大。根據 2020 年 10 月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公布數據，美國最富有的前 50 名富豪擁有 2 兆美元資產，而所得較低的後半部 1.65 億美國人，其財富總和僅 2.08 兆美元，貧富差距之大，令人咋舌。美國疫情再起，但聯邦政府對民眾的紓困金在今年 9 月截止，紓困若不延長，中下階層民眾生活勢將再受打擊。

美國因為 COVID-19 的爆發，使得貧富差距加劇，許多家庭在疫情期間須接受援助才能維持生計。（Photo Credit: U.S. National Guard photo by 1st Lt. Kyle Kilner, https://www.nationalguard.mil/Resources/Image-Gallery/News-Images/igphoto/2002318114; Governor Tom Wolf, https://flic.kr/p/2kJqgBN）

疫情拉大美國貧富差距，使得中下階層仇富聲浪高漲，美國非營利組織 ProPubica 今年公布一份美國國稅局鉅富的繳稅資料，顯示 2020 年美國前 5 名首富的稅率最高不到 3%，遠低於美國平均 37% 的稅率，輿論譁然。拜登政府已決定提高大企業與富人稅率，年營收 5 百萬美元以上企業稅率由 21% 提高為 26.5%；美國眾議院亦於 9 月 21 日通過 2.1 兆美元加稅案，將個人年收入 40 萬美元或夫妻合併收入達 45 萬美元以上者，稅率由 37% 調高為 39.6%。但共和黨認為此舉將對美國企業及自由經濟造成嚴重打擊，誓言反對到底。

結語—美國政治衰敗的困境

總結而言，美國 COVID-19 疫情因兩黨理念價值對抗而惡化，也造成了南北區域分岐，其本質是共和黨政客以人命為代價以延長自身的政治生命；在經濟面，中下階層則是受創最深，並擴大了貧富差距與階級對立，美國經濟體亦在疫情衝擊下，面臨重大結構性變化，使得中下階層未來重返職場更加困難。曾擔任官員的美國學者何慕禮（John Hamre）及卜睿哲（Richard Bush）認為，美國當前的困局，是美國政治衰敗及體制崩壞的結果，可能要花上 20 年以上的時間才能走出困境。

疫情下的臺灣經濟復甦：以投資「女性經濟力」為例

◆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 譚偉恩

IMF 指出，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尤其是重創較多從事於服務、零售或旅遊行業等的女性收入。

經濟衝擊 反映出各國對性別平權的努力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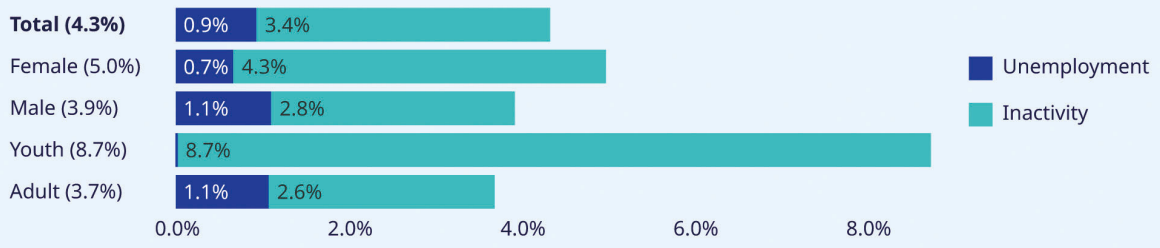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在今（2021）年 1 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疫情下的全球經濟飽受重創，其影響在女性、年輕世代、低收入者更為嚴峻。[1] 牛津樂施會（Oxfam）的調查指出，疫情在一年內導致全球女性收入上的損失高達 8 仟億美元。[2]

疫情下的經濟衝擊反映出許多國家對於性別平權的努力不足，也同時提醒吾人若想要在疫情中迅速復甦經濟，將不可忽

[1]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種脆弱群體中，年輕世代和低收入者的女性人口比例明顯高於男性。詳見：IMF (January 202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via at: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1/01/26/202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

[2] 參考：https://www.oxfam.org/en/press-releases/covid-19-cost-women-globally-over-800-billion-lost-income-one-year

Figure 8. Decomposition of employment losses into changes in unemployment and inactivity, by sex and age, world, 2020 (percentage)



Note: The two bars in each row show the difference in, respectively, unemployment and inactivity (withdrawal from the labour force) in 2020 as a percentage of employment in the "no pandemic" scenario. The total of the bars in each case is the difference in employment compared to the "no pandemic" scenario. The percentages inside parentheses that appear after the names of the demographic groups indicate the employment loss for each particular group. Youth = aged 15–24 years; Adult = aged 25+ years.

Source: ILO estimates.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最新報告顯示，2020 年全球減少之勞動率女性高於男性，年輕世代高於壯年世代。（Photo credi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7028.pdf）

視對女性經濟權益之保障。如果一個國家在教育制度上存在性別歧視，導致女性的入學率比男性低，那麼該國的女性人力資源品質會因此惡化，對其經濟發展構成限制。[3] 此外，勞動市場上的性別歧視會妨礙企業生產和管理上的創新，讓企業文化過於集中在特定性別的思維上。事實上，統計數據顯示，性別不平等妨礙了經濟上的多樣性與彈性，而經濟多樣性較弱的國家在出口貿易上的表現也多半比較差。[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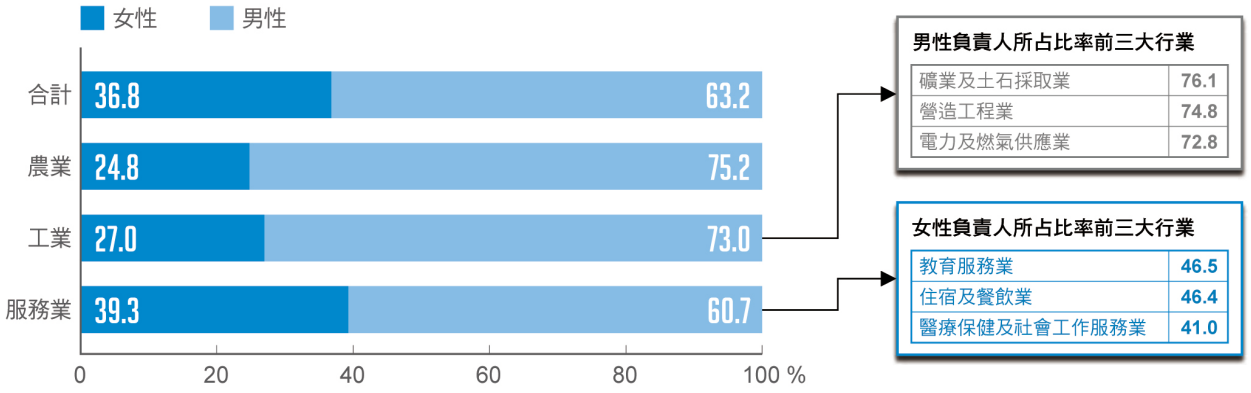
有鑑於此，臺灣不可輕忽對自己本國女性經濟力（the power of womenomics）

印度社會中，女性的人權與教育權普遍低落，使她們無法接觸到與男性相同的教育與勞動機會。（Photo credit: UN Women Asia and the Pacific, https://flic.kr/p/2mke2rE）

的投資，甚至應該持續改善各個面向的性別平權狀況。亦即，疫情之下的臺灣不只需要經濟復甦，還需要轉型成為一個兼顧性別平等和社會公義的包容性經濟體。

[3] 印度就是屬於這種情況。參考："India Ranks 116 in World Bank's Human Capital Index," *The Hindu* (September 17, 2020), via at: https://www.thehindu.com/business/Economy/india-ranks-116-in-world-banks-human-capital-index/article32627733.ece

[4] High levels of gender inequality, as measured by an extended ver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levels of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 combined measure of export product variety and equality in export shares).



來源：經濟部「性別統計」專區。

說明：中小企業負責人若為法人或外國人，統計時未將其納入。農業含農林漁牧，工業含礦業及土石採取、製造、電燃氣、用水、污染整治及營造工程，服務業含批發零售、運輸倉儲、住宿餐飲、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金融保險、不動產、專業及科技服務、支援、教育、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藝術、娛樂休閒與其他服務。

在行政院發布之《2021 性別圖像》中，臺灣女性企業主的產業別明顯呈現集中化，以教育服務業和住宿及餐飲業為大宗。（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處，https://gec.ey.gov.tw/Page/8996A23EDB9871BE）

疫情下的臺灣經濟

由於 COVID-19 係自中國大陸武漢爆發，對於將生產據點設於大陸或產品銷售以大陸為主要市場的企業影響較大。如果這樣的企業在一國 GDP 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該國當然也就成為疫情期間經濟損失較為慘重的受害者。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臺灣製造業是以半導體、面板、石化、鋼鐵為主，這些產業的主要生產地點是臺灣，而產品最終的主要銷售市場是在歐美地區，故疫情期間受到的衝擊有限。[5] 相較之下，臺灣的服務業、餐飲業、旅遊業在政府防疫政策的限制和民眾消費行為的調整下，面臨直接且立即的衝擊。

臺灣職場女性受限於傳統觀念，需一肩扛起照顧老人與孩子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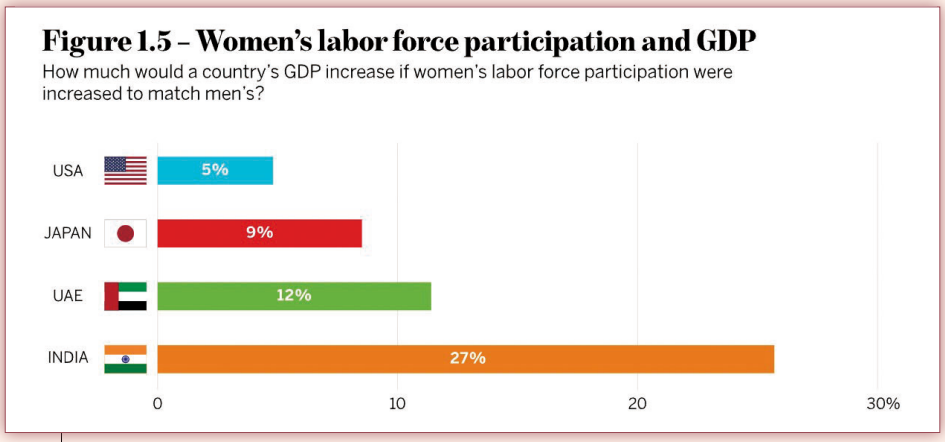
疫情讓女性收入嚴重減損

在行政院發布之《2021 性別圖像》中，臺灣女性企業主的產業別明顯呈現集中化，以教育服務業和住宿及餐飲業為大宗，占比皆超過 46%，醫護類位居第三。[6] 其原因可能與這些產業的進入門檻較低或資金需求較少有關。對照之下，臺灣女性在資訊、傳播或科技類型的產業較少擔任企業主。

[5] 事實上，疫情爆發的第一年，臺灣相較於全球許多國家，經濟表現相當亮眼。詳見：“Covid-19 Has Ravaged Economies All Over the World—but not Taiwan’s,” *Economist* (December 3, 2020), via at: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0/12/02/covid-19-has-ravaged-economies-all-over-the-world-but-not-taiwans

[6]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1 性別圖像**，頁 5。

當COVID-19衝擊時，女性失去就業機會的比率高於男性。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的相關報告也指出，女性就業率在疫情爆發的第一年下降了 5%，而男性則下降 3.9%。[7] 女性因為在許多國家的勞動市場地位較低，容易成為疫情期間被優先犧牲之群體，而當她們試圖尋找新的工作或在疫情平緩後嘗試重返職場時，又經常面臨家庭因素的阻礙，例如還在停課的孩子或是失智和行動不便的父母需有人照護。[8]



根據 IMF 報告，無論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只要將女性勞動力的參與程度提升至與男性相同水準，都可以使該國獲得 GDP 的顯著提升。（Source: IMF,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17/eng/spotlight.htm#gender）

女性經濟力是疫後復甦的關鍵

《經濟學人》雜誌在多年前曾專文指出，世界經濟漸漸掌握在女性手中，「女性經濟力」將會是接下來數十年驅動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9] 另根據長期資料觀察，臺灣女性因教育程度提升及服務業市場的穩定發展，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提升，並於 2012 年首度突破 50%。[10] 目前，臺灣女性的就業情況和鄰國日本及南韓頗為相似，但與北美地區的美國和加拿大相比，就業率顯得稍低。[11]

IMF 曾於 2017 年的報告中指出，如果女性勞動力的參與程度提升至與男性相同水準，那麼無論什麼發展程度的國家都可以獲得 GDP 的顯著提升。舉例來說，已開發國家如日本可提高約 9%，美國可提升約 5%，而開發中國家則可望提升更多，以印度來說大約是 27%。[12]

---

[7] ILO, *A Gender-Responsive Employment Recovery: Building Back Fairer*, available at: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emp/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751785.pdf

[8]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今年 3 月公布了《全球性別落差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指出疫情讓性別落差變得更為明顯，倘若要達到理想的性別平等狀態，至少還需要 135 年的時間。而在諸多落差現象中，女性較容易失業的問題引起關注，其原因又與各國的防疫政策有關，特別是增加女性居家照顧子女與長者的時間。

[9] "Women and the World Economy: A Guide to Womenomics," *Economist* (April 15, 2006), via at: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06/04/12/a-guide-to-womenomics

[10] 詳細資料可參見：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1331115820GEYI9ZG4.pdf

[11] 然而，與鄰近的新加坡相比，我國女性就業率明顯較低。新加坡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超過 60%，比一些歐美國家還高。詳見：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1112&ctNode=516&mp=4

[12] 詳細資料可參考：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17/eng/spotlight.htm#gender

前日相安倍晉三於任期內開始發展女性經濟力，目標提升日本 GDP，厚生勞動省也因應政策，為改善女性就業市場提出具體措施。（圖片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中小企業女性活躍促進事業，https://joseikatsuyaku.com）

根據經濟部 2020 年的《中小企業白皮書》，女性企業主占臺灣中小企業近 4 成之比重，而由女性經營管理的中小企業在經濟貢獻度上不容小覷。有相關研究指出，平均 1 美元的投資，女性企業主能創造 78 美分的產值，明顯高於男性的 31 美分。[13]

日本發展女性經濟力，讓 GDP 明顯增加

以日本為例，日本是人口結構老年化很嚴重的國家，同時基於文化因素較不鼓勵已婚女性投入職場。因此，雖然身為已開發的工業先進國家，但女性就業率遠低於歐美的已開發國家。[14] 然而，在經濟持續衰退的壓力下，前首相安倍晉三於任期內開始積極發展女性經濟力。[15] 根據 2018 年的統計，日本因為改善工作場域的性別環境，減少對女性的歧視，同年 GDP 明顯增加。日本總務省在 2019 年 2 月發布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2018 年日本女性的就業率達到 51.3%。2019 年 7 月底，日本總務省再度調查發現，女性就業人數已突破 3 仟萬（有史以來最高）。[16] 基於臺、日兩國在人口老年化和女性就業情況上的相似，日本投資女性經濟力的政策值得我們借鏡。

[13] Katie Abouzahr et al., *Why Women-Owned Startups Are a Better Bet*, via at: https://www.bcg.com/publications/2018/why-women-owned-startups-are-better-b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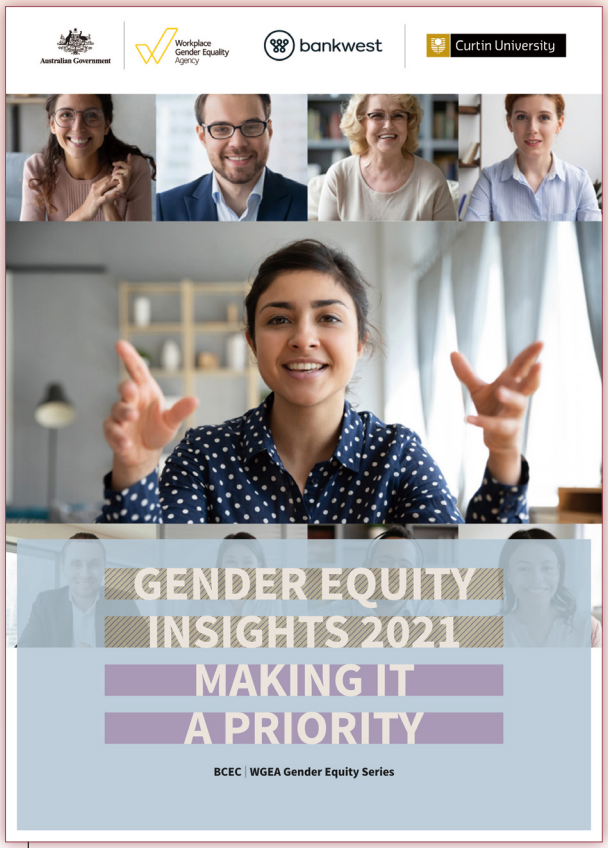
[14] "Land of the Wasted Talent," *Economist* (November 5, 2011), via at: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1/11/05/land-of-the-wasted-talent

[15] 若日本女性勞動參與率能夠與男性看齊，勞動人口將可增加 820 萬人，GDP 也可望成長 15%。詳見：Jiyeoun Song, "Economic Empowerment of Women as the Third Arrow of Abe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Vol. 22, No. 1 (June, 2015), pp. 113-128.

[16] "Japan's Efforts to Make It Easier for Women to Work are Faltering," *Economist* (November 26, 2016), via at: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16/11/24/japans-efforts-to-make-it-easier-for-women-to-work-are-faltering

澳洲發展女性經濟力，讓企業獲利能力較多

除日本外，澳洲的經驗也可作為參考；首先，澳洲的職場性別平等署（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gency, WGEA）與該國一些智庫合作，對該國女性投入職場及參與勞動的情況進行研究與分析，發現在前200大公司中，女性參與率越高的，整體表現與獲利能力也進步地較快。WGEA同時指出，薪資待遇上的不平等會對女性的經濟安全造成影響，應視為一種人力資本的政策疏失。鑑此，澳洲官方在疫情期間很積極確保女性的職場權益與經濟安全，甚至有協助女性重返職場及相關的財務支援措施。[17] 此外，澳洲也與當地政府攜手促進女性參與跟銷售活動相關的工會組織，讓女性權益能夠被聽見與制度化。臺灣在南太平洋目前有4個邦交國，以提升性別平權和促進經濟發展為方向的外交政策，可以進一步深化我們與這些邦交國的實質關係。[18]



澳洲的職場性別平等署於2021年發布的《性別平等洞察報告》指出，在前200大公司中，女性參與率越高的，整體表現與獲利能力較多。（Photo credit: BCEC, WGEA, https://www.wgea.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BCEC%20WGEA%20Gender%20Equity%20Insights%202021%20Report.pdf）

臺灣應如何發展自己的女性經濟力

疫情爆發後，許多國家在照護產業皆出現嚴重的人力匱乏，而這樣的情況導致從事照顧工作的女性面臨極大壓力和風險。當一個國家在照護產業上欠缺制度面的保障時，意謂著該國對於照護勞動力的投入欠缺認知，甚至可能停留在照護工作是一種低經濟貢獻的產業。因此，任何想在疫情中盡快復甦經濟的國家都應該開始思考如何投資照護產業，提供適當合理的薪資並建立安全的工作環境，特別是在制度上認可參與照護工作的勞動者，同時給予足夠之保障。

[17] 詳見：https://pmc.gov.au/office-women/economic-security/wess

[18] 以目前臺灣和南太平洋邦交國的實際經濟互動狀態來看，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參考：譚偉恩，「邦交與斷交之外交關係研究」，**國際與公共事務**，第11期（2019年12月），頁50。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曾在 2018 年發表過一份報告，呼籲亞洲國家正視女性經濟力，設法讓女性有更為公平的管道和機會就業，以大幅提振國家的經濟成長。[19] 對臺灣來說，政策上應支持並提供資源給從事照護工作的產業及參與其中的女性勞動者及產業。這種產業對於人口結構步入老年化的臺灣十分重要（前述日本之例可為借鑑）。

鼓勵女性參與 STEM 領域行業

相較於在疫情中面臨較大衝擊的服務產業，能夠借助通訊科技與物流完成經濟活動的產業在疫情期間不僅受創較輕，甚至業績反而逆勢成長，但臺灣女性因為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以下簡稱 STEM）等領域參與較少，無法享有此優勢。[20]

由於 COVID-19 疫情何時會結束還無法確定，同時新型病毒擴散的風險仍未排除，產業營運朝向自動化和減少對傳統人力的仰賴一定會成為趨勢，這將造成低階技術或易於被自動化取代的勞工面臨失業風險。事實上，臺灣若要發展 5G 與 AI 並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投資女性參與 STEM 絕對是必要的方向。

---

[19] Jonathan Woetze et al., *The Power of Parity: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in Asia Pacific* (April, 2018), via at: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gender-equality/the-power-of-parity-advancing-womens-equality-in-asia-pacific

[20]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一份 2016 年的統計，臺灣只有約 30% 左右的女性在大學時期選擇與 STEM 相關的科系，而這樣的情況在過去 4 年內沒有明顯改變。

通訊科技產業在疫情期間不僅受創較輕，甚至業績反而逆勢成長，但臺灣女性因為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領域參與較少，故無法享有此優勢。

投資女性經濟力 為緩解勞動力老化缺口關鍵

與全球其他許多經濟體相較之下，臺灣總體經濟並未因疫情受到重創；然而，疫情之下女性較易失業之情況確實也發生在位處亞太地區的臺灣，這意謂著疫情危機凸顯出女性在性別失衡的社會結構下，不但承擔更高的失業風險，還要扛起更多的家庭照護責任，導致她們在疫情期間減少參與勞動市場之機會。此種結果不僅讓落實性別平等的努力被削弱，還同時阻礙了國家的經濟復甦與競爭力提升。

性別不平等是疫情期間一個普遍存在於各國勞動市場的現象。然而，那些努力改善職場兩性平權的國家或企業，往往可以擁有較好的復甦機會與獲利表現。此外，從日本的經驗及澳洲的實踐可知，投資女性經濟力不但可以緩解臺灣勞動力因人口老年化而出現的缺口，還可同時作為深化我國與邦交國互動關係的一項政策。

經貿協定 Q&A：臺灣如何找尋最大經貿利益

◆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 林士清

中國大陸與臺灣先後於今年 9 月份遞出加入 CPTPP 的申請，此次成功與否對臺灣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臺灣仍應善用 APEC 機制，以避免因國際政治因素被 CPTPP 排除在外。

APEC 介紹

「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APEC，成立於 1989 年，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經貿合作論壇，會員除我國外，尚有美國、中國大陸、日本與澳洲等 21 個環太平洋的國家。APEC 成立宗旨在於「貿易暨投資自由化」、「商業便捷化」及「經濟暨技術合作」，達成亞太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之目標。

APEC 並非全然只是針對貿易的國際組織，其主要係以定期會議進行開放式的對話，全體的共識作成決議，會員採自願方式執行，不具強制的拘束力；除了傳統的貿易議題外，也納入與貿易相關的跨領域

APEC 並非全然只是針對貿易的國際組織，其主要係以定期會議進行開放式的對話，會員採自願方式執行，不具強制的拘束力。（Photo Credit: APEC, https://www.apec.org/Press/Photos/2020/0221_SOM）

議題，諸如：能源、海洋與漁業、反恐、婦女及災害應變等，議題範圍廣泛。我國向來積極參與，透過 APEC 的各項會議與活動，建立出臺灣專業、活躍以及有所貢獻的國際正面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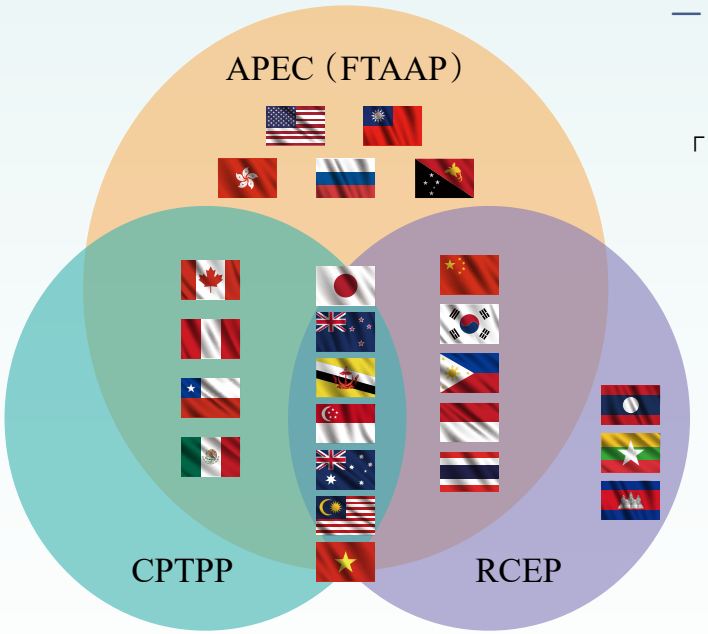
FTAAP 意涵

「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簡稱 FTAAP，於 2004 年由加拿大代表所提出，是 APEC 為消除成員國的貿易壁壘，推動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而設置的區域型自由貿易區。具體來說，成立 FTAAP 為 APEC 的願景，APEC 的 21 個經濟體領袖所各自任命的 3 名企業代表，其所成立的企業諮詢委員會（簡稱 ABAC），已透過成立「FTAAP 小組」（Group for FTAAP）展開相關工作，期待達成實現 FTAAP 的最終夢想。

世界銀行（World Bank）曾於 2016 年指出，若 FTAAP 能推動生效，臺灣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及出口成長將猶如注入強心針，大大助益臺灣經濟發展。然而，FTAA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區域性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等各項亞太地區經貿協定，究竟是相輔相成，抑或另起爐灶互相抗衡，研究者尚無定論。不過，估算 FTAAP 涵蓋的 21 個 APEC 會員體之貿易總量遠高於 CPTPP 或 RCEP，且考量 CPTPP 或 RCEP 仍有競爭關係，因此，FTAAP 絕對是臺灣加入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最佳選項。

各經貿協定之特色與挑戰

一、CPTPP 為全球最高標準的經貿協定



首先，因美國川普政府時期退出原「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爾後由日本接續主導，並於 2017 年 11 月改名為 CPTPP，目前共有日本、澳洲與新加坡等 11 國成員國，其中大多為我國主要的貿易夥伴，占我國際貿易總額超過 24%。CPTPP 會員國人口達 5 億，GDP 超過 11 兆美元（占全球 13.1%），對我國的重要性不言而

項目	CPTPP（11 國）	RCEP（15 國）	FTAAP（21 國）
參與國	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秘魯	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中國、日本、南韓、紐西蘭、澳洲	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中國、香港、印尼、日本、南韓、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菲律賓、秘魯、俄羅斯、新加坡、泰國、臺灣、美國、越南
生效時間	2018 年 12 月 30 日	預計 2022 年 1 月 1 日	2005 年發起
人口數	5 億	22 億	39 億
占全球人口比例	7%	30%	40%
占全球 GDP 比例	13%	30%	60%
貿易規模全球占比	15%	28%	48%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外交部、自由時報，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476567。

圖 1　CPTPP、RCEP、FTAAP 比較

喻。據國發會主委日前受訪表示，若臺灣順利加入 CPTPP，將有 GDP 達 2% 以上的經濟效益。

英國脫離歐盟之後積極在亞太地區擴張經貿影響力，尋求加入 CPTPP 成為英國重返亞太的敲門磚。美國與中國大陸先前因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產生重大隔閡，大國政治問題仍然是 CPTPP 尋求擴張的最大挑戰。加入 CPTPP 的門檻極高，不僅須通過成員 11 國共識表決同意，還涉及電子商務和智慧財產權等高標準規範，相信臺灣已做好充足的入會準備。

二、RCEP 為全球最大的經貿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 RCEP，於 2011 年由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所發起，其旨在深化以東協為核心之區域經濟整合，歷時 8 年談判，於 2020 年在越南簽署協定，將於 2022 年初正式實施，會員國包含中國大陸、日本與 ASEAN 等 15 個國家。

RCEP 雖由東協 10 國發起，然近年開始由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並主導，目的在抗衡原本以美國為核心的 TPP（即 CPTPP 前身）。RCEP 經濟規模將近 26 兆美元，約占全球 GDP 的 30%，是全球經濟規模最大、涵蓋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協定。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印度擔心加入由中國大陸主導的 RCEP，將面臨中國大陸廉價產品大舉入侵，重創國內製造業與農業，使自身經濟弱化，故印度於 2019 年 11 月退出談判，暫時不加入 RCEP。

另外，RCEP 成員國向來是我國主要出口市場及投資地區，無論電子、資通訊、生化醫療及汽車零組件等，臺灣已與東協各國建立緊密產業分工體系。然由於現階段中國大陸在 RCEP 中占據主導地位，臺灣若要加入 RCEP，勢必得在政治與貿易層面上作出讓步，對臺灣不見得是利多。

三、FTAAP 進展緩慢，締約仍有希望

再回顧 FTAAP 的演進概念，始於 2004 年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鑑於亞太區域內雙邊貿易協定疊床架屋，致使亞

印度擔心加入由中國大陸主導的 RCEP，將對國內製造業與農業產生負面影響，故印度於 2019 年 11 月退出談判，暫時不加入 RCEP。（Photo Credit: IFPRI, https://flic.kr/p/Jakgsj）

我國的電子、資通訊、生化醫療及汽車零組件等，皆已與東協各國建立緊密產業分工體系。

1994 年，APEC 經濟體各代表在印尼茂物市提出「茂物目標」，設定開發中經濟體於 2020 年之前實現貿易與投資自由化。（Photo Credit: APEC, https://www.apec.org/About-Us/About-APEC/Fact-Sheets/Bogor-Goals）

太地區經商環境嚴重惡化，因此向 APEC 領袖們提出建議希望透過 FTAAP，達成 APEC 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s）。[1]

FTAAP 雖然牽涉經貿層面甚廣，但路徑整合才是 APEC 會員體真正在乎的議題，CPTPP 的高規格注定讓開發中國家經濟體望洋興嘆，而 RCEP 所關注的包容性，因區域政治因素，導致擴展有限。因此，若由 APEC 主導將 CPTPP 及 RCEP 自然匯合而成，絕對是成就 FTAAP 的最佳考量，然現實面是 APEC 本身的主導力量較弱，且難以解決 APEC 會員體之間彼此經濟發展階段過於懸殊的難題。

歷經 20 年後，雖然 2020 年的「茂物目標」尚未實現，然於 2020 年 11 月 APEC 領袖會議通過「吉隆坡宣言」，再度強調將朝持續推動 FTAAP 工作前進，亦即實踐 FTAAP 仍有希望。

四、雙邊協定 VS. 多邊協定

亞太區域內經常形成各種推動多邊的區域經濟合作協議，以及各種類型的雙邊協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BFTAs）。過往學者認為，若亞太地區過於頻繁的 BFTAs，恐危害到 APEC 之組織運作，即 BFTAs 累計數量愈多時，實際影響力恐超越 CPTPP、RCEP 或 FTAAP 等多邊經貿協定。[2]

[1] 茂物目標（Bogor Goals）於 1994 年在印尼茂物召開的 APEC 領袖會議中被提出，此目標要求會員國中已開發與開發中的經濟體，共同於 2020 年實現亞太地區的貿易自由化。

[2] 學者曾就 APEC 會員體的 BFTAs 是否會影響 APEC 核心議程進行研究，結果認為 BFTAs 影響力並非外界所普遍認知，即千篇一律的「危害說」；亦即 BFTAs 是否為 APEC 的「奠基石」（building block）或「絆腳石」（stumbling block）仍未有定論。參考：黃偉峰，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組織運作之衝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010，第 23 卷第 4 期，頁 299-445。

亞太地區各國在地理位置、人口結構、政治態度、宗教信仰、經濟發展等方面都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和複雜性。

亞太區域經貿整合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成員發展條件差異過大的情境，尤其是亞太地區在地理位置、人口結構、政治態度、宗教信仰、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和複雜性。CPTPP 與 RCEP 兩大多邊經貿協議集團交鋒，恐讓向來倡導開放性的亞太地區變得更不安定。不過，在目前全球貿易壁壘的保護主義催化下，亞太地區的 BFTAs 洽簽，或許反會成為另類主流。

結論：找尋臺灣的最大經貿利益

相較於 RCEP 剛問世時的雷聲大，現在變成雨點小，RCEP 強調的包容性，反讓國際輿論不太看好其未來的擴張性；反而是 CPTPP 在一路歷經美國退出和日本接盤後而逐漸穩定，第二輪談判業已吸引哥倫比亞、菲律賓、泰國、印尼、韓國及我國等經濟體躍躍欲試，美國甚至作出不排除考慮重新加入的表態，甚至遠在大西洋的英國在脫歐之後也對 CPTPP 感到興趣，讓 CPTPP 的後勢看漲。

值此觀之，FTAAP 的可能實踐途經，包括：由 CPTPP 主導、RCEP 主導、APEC 主導或各類 BFTAs 取代之。本文建議有三：第一，我國仍應強化與亞太區域經濟體間的 BFTAs，包含維繫新加坡、紐西蘭簽署 BFTAs，並擴大與其他經濟體簽署 BFTAs 的可能；其次，我國作為 APEC 會員體之一，堅持 APEC 持續育成 FTAAP，遵循「茂物目標」中對貿易與投資環境之自由化、便捷化，讓 FTAAP 倡議有能力讓 APEC 的所有成員國均能受益；第三，我國仍需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避免因國際政治因素被 CPTPP 及 RCEP 兩大集團排除在外。